

潘淑華：《閒暇、身體與政治：近代中國游泳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年。309頁。NT\$600。

2020年4月24日，海外最大中文媒體《大紀元時報》的「史海鉤沉」單元，刊載了一篇〈毛橫渡長江比世界紀錄快一倍成笑話〉的報導文章。該文記者駱亞回顧中共央視的《朝聞天下》節目，在2013年7月16日播出47年前毛澤東橫渡長江的三分鐘黑白影片，如何引發網民關注：「人們根據該報道計算出來毛澤東游泳速度要超過世界自由泳的世界紀錄，幾乎快一倍。毛橫渡長江新聞竟成為網絡當天最大的笑話。」¹記者以「黨媒的吹捧，令網絡很多人反感」來展開報導，並引用許多網絡言論，嘲諷中共官方宣傳（毛游泳速度）的誇大失真。游泳在此，成為當代反專權的輿論，批評中共官方不實展示近五十年前毛澤東具現國族身體的象徵媒介。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潘淑華，在其新書《閒暇、身體與政治：近代中國游泳文化》中，則為讀者揭露游泳在過去百年中國政治及休閒文化發展的豐富歷史樣貌。此書說明了游泳為何且如何得以被賦予超越其作為個人身體運動之外的多重意涵。這是一本主題涉獵廣泛、史料運用得當、論述縝密深入的佳作。作者遊刃有餘地在多國跨語際的時空脈絡中，參照學科的理论著作，縷述游泳以「西式的閒暇體育活動」（頁3）之姿進入中國後，其個體實踐與團體組織、流行時尚、城鄉關係、休閒文化、社會資源及國家權威交織出的歷史進程。全書充分展現作者博覽群書、舉一反三與考掘史料的功力；其兼有宏觀視野與微觀分析，內容精采不枯燥，相當引人入勝。如此書標題所示，「閒暇」、「身體」與「政治」為作者切入探究近代中國游泳文化的三大視角。從這三個視角出發，作者主要呈現出「閒暇」與「身體」如何在民國及其後階段被「政治化」的過程：閒暇活動不只涉及「民眾對自身生活模式及節奏的選擇」，更「反映當權者對民眾思想行為的模塑」（頁8）；而身體，則不僅是「個人感官經驗及時代信念的載體」以及「呈現與建立身分認同的場域」，也是「體現集體意志及實現集體利益的工具」（頁11）。在相當程度上，「閒暇」與「身體」的「政治化」，正可謂作者論證古已有之的游泳活動在近代中國所具有的新時代特性。在此三大視角的基礎上，作者還著力發揮「空間」和「階級」兩大元素，在近代中國游

¹ 駱亞：〈毛橫渡長江比世界紀錄快一倍成笑話〉，《大紀元時報》，2020年4月24日，<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0-04-24/86421362>；讀取日期：2022年1月18日。

泳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作者所言，「空間決定身體的經驗，同時也為身體賦予意義」（頁17）。此書處理的，包括空間所表達的身體實踐，體現的社會關係，引發的城鄉互涉，導致的兩性互動，以及涉及的權力角逐。尤有甚者，因為作者視游泳場為「介於秩序與失序之間的『臨界空間』（liminal space），被允許與不被允許的行為界線變得模糊，不時上演自由與規訓的拉鋸戰」（頁18）。此書的章節安排，便特別關注游泳（場）空間的建構，及其牽涉的主體性與各種權力彼此的競逐。至於階級，則從十八世紀的西方開始發展出游泳的休閒文化以降，一路到共產黨建國後的中國，都與海浴空間的建構、使用及承載的意涵，有著密切關係。此外，作者也從男女分/合泳政策、泳衣時尚、兩性互動等方面，處理游泳所涉及的各種「性別」元素。

社會文化視角的游泳史

作者在〈緒論〉中，強調此書並非近代中國游泳體育史，而是從社會文化史的視角，「結合跨國史、地域史、城市史及身體史等研究取向」（頁18），來考察近現代中國的游泳文化。換言之，在此書中，游泳幾乎從來不只是一個人在水中的肢體運動，游泳的處所也非家裡自有的游泳池；作者透過社會文化史視角所考察的游泳，不單是屬於個人或某些組織的體育運動，「也是『文化實踐』及『權力體現』」（頁18）。在這樣的概念架構上，作者圍繞游泳攸關閒暇文化與身體政治的歷史關鍵時刻或事件，規劃出主題各異的六章。根據作者所說，這六章旨在「分析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現代國家建構、摩登身分的追求及毛澤東崇拜等多種力量交織下，游泳文化在現代中國的發展及傳播」（頁18）。此書的前三章，分別聚焦於香港、廣州與上海，以其作為具代表性的城市，呈現游泳文化在中國的進展演變與時代特色。

此書第一章〈游泳的跨國史〉，以香港作為游泳從英國輸出、進入中國的起始點，突出游泳在中國的興起與殖民主義息息相關的歷史背景。作者先界定「本書所討論的游泳，是十八世紀在西方以海浴（sea-bathing）為基礎發展出來的現代游泳文化」（頁24），以此有別於游泳在傳統中國展現的型態，包括其曾是某些（例如南方瀕海）地區人民的生活習性、娛樂活動，或被視為作戰時可發揮的軍事技能，乃至於宗教儀式的一部分。之後，她開始解說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如何「扮演了把現代游泳概念及活動傳播到華人社會的中介角色」（頁31-32）。基本上，英國的「公共衛生」與「閒暇」概念、香港有綿延海岸線的地理優勢、與華人體育會的興起等因素，交相促成游泳在香港華人社會的

勃興與逐漸盛行。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峙，尤其在由華人體育會推廣的游泳運動中，隱然可見；游泳在香港也因此帶有著「一方面凝聚了香港華人，另一方面也加強香港華人與中國的連繫」的國族主義意涵（頁38）。此外，這章還分析由英國傳入的西方游泳知識，如何透過體育團體成員（尤其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及南華體育會）的社會網絡與印刷媒體的文圖資訊兩大途徑，在中國華人社會散播開來。這個傳播過程重要地將游泳從「閒暇活動」，提升成具「標準」游泳姿勢、「合適」游泳衣並以「規範」泳式進行競賽的「專業技術知識」。這些在香港體育團體形成的游泳知識，出現從西化與教育程度較高的香港華人向普羅階層與香港之外（主要是廣州）傳播的情形。

接著，作者在第二與第三章，分別以廣州和上海的游泳場為研究對象，發展重點有別的論述。第二章〈城市閒暇空間的建構與規訓：民國廣州游泳場〉，比較著重於游泳活動在游泳場所創造出的閒暇空間，及在其中引發民眾休閒自主與政權規範約束的權力拉鋸戰。作者先討論廣州以基督教青年會與嶺南學堂為主的組織，於二十世紀初在該城推廣游泳的貢獻，並梳理不同組織重點有別的推廣特色（基督教青年會強調其游泳池的現代性，嶺南學堂則重在體現其游泳池展現的師生團體精神）。作者並透過對廣州市東郊的「東山游泳場」（正式名稱為「東山水上游藝會」）的發展過程，說明香港如何促進廣州的游泳文化。繼而，作者說明游泳如何一開始隨著有志之士強國保種、體育健身的國族精神而為人所知，不久更迅速發展成廣大民眾悠閒戲耍的閒暇空間。正是在游泳場這個新興、西式的閒暇空間中，出現了青年男女親密互動、眾人吃喝玩樂與觀賞表演等行為，並因此導致衛道人士批評與市政當局干涉。游泳作為運動與休閒，提供中國男女前所未有的肢體親密接觸機會；游泳場成了兩性「約會的公共空間」，游泳成為風尚，「與男女自由戀愛的風尚因而是密不可分的」（頁71）。從空間功能及相關意涵來看，游泳場具有閒暇空間、約會空間、表演空間與觀賞空間等多重功能，並隱含解放（兩性互動）與（因此被當局視為）危險等對立含義。本章最後小節，以廣東省政府在1934年6月實施的「男女分泳」政策及其引發的爭議為例，說明廣州游泳場如何成為政府監控個人行徑與民眾多方反抗的重要場域。作者提供了不只思想（知識男性對泳畔「摩登女性」行為的焦慮等）氛圍、還有以國民黨政府推廣的新生活運動為主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如國貨運動等經濟因素，綜合分析此一政策出現的前因後果。她接著援用報章史料，舉例說明廣州市民及游泳場經營者種種「陽奉陰違、取巧或逃避等『消極抵抗』（passive resistance）方式」（頁84），如何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該政策的效力。

在第三章〈閒暇中的權力關係與身分建構：民國上海游泳場〉中，作者利用上海這個由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與華界共同組成的國際性都會為個案，闡述該市的游泳文化，如何除了展現市民對現代生活的享受，也明確體現「華洋」與「男女」爭取平等的身分認同。相對於作者在第二章呈現出廣州游泳場作為閒暇空間的建構與（抵拒）規訓過程，她在第三章著重的是游泳文化所蘊含的種族性、階級性與現代性，以及不同身分的族群與個體如何通過在游泳場的表現，相爭建立主體認同。租界游泳池與上海浦東東北市郊的高橋海濱浴場，是第三章展現各方權力競逐的兩大主要空間。在上海，由於華洋界線之故，該市的公共游泳設施遲至1928年才對中國人開放，此後游泳才逐漸在上海華人社會普及開來。而爭取進入租界游泳場，對上海華人來說，不只得以享受游泳休閒之樂，也是華洋種族平等的重要象徵。作者進而透過交代高橋海濱浴場從發現海濱地點，到開發與經營海濱浴場的來龍去脈，展現上海市公用局、投資商人、中外泳客與高橋當地鄉民，在高橋海濱浴場被打造成上海市民理想避暑勝地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族、階級、城鄉等權力互涉。此外，第三章也剖析了上海游泳場中的性別界線，及蓬勃發展的上海出版界如何再現游泳場內外的兩性互動。作者從當時男女論者對「男女共泳」或「男女分泳」的看法出發，說明游泳場作為既是（尤其女性）泳者「演出」、也是（尤其男性群眾）「觀賞」的社會空間所引發的討論與爭議。如作者所言，泳池雖可能「被男性視為提供合法途徑窺看女性身體的公共空間」（頁116），同時卻不妨礙「女性亦希望向旁觀者、甚至報刊讀者展示其穿上時尚泳裝的摩登身體」（頁117）；泳池內外的性別表現，並非簡單僵化的「男性窺視、女性被看」一語可概括。而報刊雜誌所刊登上海摩登女性引以自豪的泳裝或泳畔照片，則使讀者得以超越泳池的空間與地域界線，想像或艷羨摩登女體。

第四章〈泳衣時尚、現代身體與楊秀瓊〉，不再以城市游泳場空間的建構或其中涉及的權力角逐為主題，轉而聚焦於現代身體，探討游泳如何模塑民眾的現代身體，以及泳衣怎樣裝束現代身體、形塑兩性關係，並打造現代身分。作者說明出現於西方歷史脈絡中的「現代身體」概念，如何承載工業革命以降包括醫學、公共衛生、體育運動、社會政策等發展而誕生。作者強調，現代工業社會雖出現合理化監控與規範個人身體的發展，但「我們不應忽略民眾掌控自我身體的意願與能力」（頁131）。她發揮游泳運動的兩點特性——穿上泳衣的女體不只具觀賞價值，也建構起女性的摩登身分；而游泳場也成為合法化男性偷窺女性摩登泳體的公共場所——來討論游泳這個閒暇活動，在人們理解與期許

現代身體的表現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游泳或許是諸多體育運動中，因凸顯女性曲線之故，而與流行時尚走得最近的一種。上海華人社會的游泳文化，雖比香港與廣州發展得慢，但拜其領銜全國的摩登文化與報刊出版業之賜，泳衣時尚潮流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蓬勃發展。作者以《良友》雜誌為例，歸結出女性泳衣身體得以進入主流刊物，泳衣款式益發暴露女體、顏色更鮮豔多彩且紋路更豐富，以及自1934年開始泳衣甚至有年度款式等特色。作者並綜合報刊史料，得出當時的泳衣時尚並非由上層階級往下傳播、也非底層大眾時尚影響上層奢侈消費，而是透過產品生產配合大眾傳播，同時擴散到不同的社會階層。泳衣產品所形塑出的新女性現代身體，既影響輿論對「女性美」的論述與對女體的覺知，使女性裸露的胸部與腿部成為其最受品評的現代身體部位，也允許女性建構其摩登身分。至於泳衣之於男性的現代身體，雖無涉摩登、反而以自由無拘束為重，卻也受到當局出於社會成規或符合兩性禮儀等原因，而予以監管。接著，作者以來自香港、技冠全國的年輕女泳手楊秀瓊為個案，凸顯她透過時髦泳衣自覺展現的「摩登身體」，與她優異參賽表現和獲邀表演泳術而造就出的「國族身體」，及此二者如何以「時而互相支持時而對立的狀態並存」（頁132）。作者比較分析《良友》與《玲瓏》這兩份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半期廣受歡迎的女性流行刊物所再現的楊秀瓊，說明楊雖得以自覺地參與自身摩登身體形象的建構過程，卻仍受制於報章媒體刊登她不同的泳衣照、且由此對她評論各異的輿論操作。此章最後一部分，則藉由楊秀瓊受南京國民政府之邀赴南昌表演泳術、並代表國家參加世界游泳比賽等表現，討論她被賦予高度榮譽的國族身體以及她展現時尚女性美的摩登身體之間的相生相剋互動。作者歸結「楊秀瓊是各種不同力量運作下塑造而成的」（頁173），其公眾形象的塑造，體現出她自身的主體性與國民黨、香港政府、上海報刊媒體、泳衣製造商等「各種意識形態及利益考慮共存與競爭的關係」（頁174）。

第五章〈爭奪海濱：北戴河海浴空間的民族與階級政治〉，轉而鎖定華北地區歷史最悠久的海域場地，河北省東北部的北戴河，考察該地的海濱空間被打造的過程中，所涉及城鄉、華洋與階級等元素交織出的閒暇空間政治。作者先介紹清末鐵路發展與西方人發現該地的避暑與海浴潛質，共同發現了北戴河，使其從一個鮮為人知的地理「空間」，被開發與經營成具有休閒文化意義的「地方」，並名聞中外。西方僑民在二十世紀之前已在北戴河興建房屋，成立團體自我管理。與西方人士或文化過從較密的中國政府高官與知識份子，逐漸時興到該地海濱避暑休閒。之後，隨著報章、遊記與多本旅遊指南的出版，更打響

了北戴河作為華北海濱避暑勝地的名聲。此章的第二部分，集中討論曾任交通總長的北洋政府要員朱啟鈞，如何透過成立「北戴河海濱公益會」發展該地的休旅空間，並將該地轉化成中國政商名流的休閒避暑要地，和非正式的政治談判場所。作者通過朱啟鈞的個案分析，說明海濱雖原為休旅空間，但中國政界人物對該空間的控制與管理，卻使北戴河被賦予了民族與政治意涵。北戴河也在朱啟鈞的主導下，出現許多具傳統中國特色的人文景觀，使該地的休閒文化增添新的意義與地方感。這章的下一節，則以幾本出版於民國時期的北戴河旅遊指南與不同時期出版的遊記，綜合分析其如何交相引導讀者大眾想像與消費北戴河。作者說明，這些旅遊指南（有的作者，如徐珂，甚至並未造訪過北戴河）選擇性地透過文圖再現北戴河，並主觀賦予北戴河不同的意涵（例如徐珂賦予該地的民族意義），多少影響讀者對北戴河的集體想像。通過這些出版品，旅客到北戴河所消費的不只是當地的自然景觀或河濱海浴，還有那些自然景觀被作家們賦予的歷史文化意涵。第五章最後一節，則突出「階級」元素，說明中共政權建立後，如何努力去除北戴河在民國時期由上層社會把持而沾染的資產階級色彩，並將該地的中外別墅部分改造成工人休養所及療養院，供「勞動模範」或「先進生產者」等工人短期休養，以便促進生產。作者解釋這些改造北戴河海濱空間的用途，重要地轉化了該地的意義與形象，成為中共政權「建構『新中國』的『勞動人民』典範」（頁207）的重要一環。除此之外，北戴河也成為中共中央領導人避暑休養與夏天辦公處所，且其所享用的空間，與工人修養所完全分隔。作者注意到《人民日報》等國家媒體雖頻繁報導勞動人民在北戴河進行休養與交換生產經驗，卻未提及中央領導人夏天至該處辦公或開會的消息。作者認為除保安考慮之外，應是黨中央不希望被人民視為「無異於民國時期到北戴河避暑的『剝削階級』」（頁214）。總之，在中共中央與黨媒的共同運作下，民國時期論述北戴河時的閒暇思想，被結合生產與勞動的「休養」話語所取代。

此書最後第六章〈「為革命而游泳」：毛澤東游泳身體的建構與群眾游泳〉，闡述毛澤東主導的中共政權如何改造民國時期的游泳文化，使之為黨國服務。作者充分討論了毛澤東如何化游泳為政治資源，將之融入他的政治身體與個人崇拜，透過官方宣傳，形塑他熱愛游泳的形象，並發揮游泳的意識形態象徵，以此動員群眾追隨其游泳行為與革命精神。作者在此章採取某種倒述的方式，先論毛澤東在1966年7月「暢游長江」的壯舉及其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某種精神先導的歷史意義。此章的後幾節，繼而追溯毛澤東在這之前建構起自身「游泳身體」的過程，以及游泳如何在毛與官方體育政策的推動下，成為「體現『革命』及

『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實踐」(頁220)。作者在描繪毛澤東被大肆報導的長江之泳後，分析官方宣傳如何形塑出他完美展現其(年屆73游泳十五公里仍未顯疲態的)「自然身體」與(借游泳挑戰大自然來比喻有能力完成艱鉅國家任務的)「政治身體」。毛澤東的「暢游長江」，彷彿連結了他的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無論是面對大自然、國內敵人或帝國主義的威脅，他都能夠以『閒庭信步』的姿態從容面對。」(頁231)作者並引述《人民日報》社論，闡釋游泳如何在當時，被中共黨媒銘刻上(文化大)革命「在做中學」的深刻政治意涵：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一如在幹革命中學會革命。接著，作者說明毛澤東如何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讓自己的「游泳身體」展現克服困難的象徵，並激發全民從事游泳此一群眾體育運動，來強化與鞏固他的政治能量。如同當時政治經濟上的「大躍進」運動，當時也相應地出現結合體育、勞動與國防的「游泳運動大躍進」狂熱(頁239)。作者從這部分，開始引申討論雖然大批中國群眾透過游泳展現對毛澤東的崇拜，卻也不乏有人以游泳偷渡的方式，棄絕毛澤東的專制政權。某些家長甚至名為響應毛澤東「為革命而游泳」的號召(頁248)，實則教導小孩「為偷渡而學泳」。這些否定毛澤東崇拜的舉措，使游泳成為作者所謂「意義含混的政治象徵」(頁251)，挑戰了中共官方認定「群眾游泳活動是中國全體人民集體精神的展現」(頁253)。

近代中國游泳文化的豐富樣貌：心得與省思

此書展現出相當強的學術研究企圖，即挑戰或修正過去關於中國現代性、個人/社會與國家(即書中的閒暇與政治)關係、身體史以及民眾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局限。首先，作者透過凸顯香港在近代中國游泳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角色，來豐富或補充過去學界較多以上海為研究中心而呈現的「中國現代性」。書中以香港、廣州、上海等城市研究，來論證「今後對『中國現代性』的研究，應該進而探討中國城市之間的互動及互補關係，而不應將上海(或任何其他城市)孤立來看，忽略其他地區的影響」(頁256)。此書尤其難得之處，在於討論數個城市的游泳場發展過程之餘，透過上海(高橋海濱浴場)與北戴河的個案，突破「城鄉對立」或「城鄉斷裂」的既有研究框架，使城鄉的空間、資源或權力關係產生流動的互涉。其次，在處理閒暇與政治的關係時，作者強調不應只過於機械僵化地從「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兩種途徑，來考察游泳文化在民國的發展，而應注重各種元素與時代脈絡的關聯。進而，此書所觸及的身體史層面，超越過去相關研究偏重國家等組織權威的「規訓」或報刊媒體的「再現」兩種視角，

呈現做為身體擁有者的男女個人如何透過游泳展現主體性。再者，作者藉由本書主題，證明民眾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泳實踐，如何可能影響歷史變遷，或衝擊既有的社會與兩性關係。

寫一本書，確實不可能包山包海，肯定有重點擇取，並根據史料盡可能發揮題旨論點。平情而論，此書作者確實相當程度地達成書中〈緒論〉末尾宣稱要進行之任務，即「以微觀的角度分析香港、廣州、上海及北戴河等地游泳文化的形成」（頁21）。至於結論最後一句「把不同地域拼合起來，我們才能夠對中國的整體圖像建立實質、立體的理解」（頁21），或可做為本書研究的理想。若以此一理想，或帶著類似作者有志擴大研究視野並拓展研究取徑的期許，來審視此書時，或許能繼續思考與反省某些關於近代中國游泳文化仍可繼續推展的向度。作者在〈緒論〉中說明，此書並非狹義的體育史，而是從社會文化史的視角，結合眾多研究取向來探究游泳文化在現代中國的發展及傳播。不過，作者以不同主題來架構該書各篇章，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釐清游泳在中國的整體發展面貌與歷時性演進為代價的。在此書第一章起始處，作者提及兩本現有關於游泳的社會史專書，即 Jeff Wiltse 的 *Contested Waters: A Social History of Swimming Pools in America* 與 Christopher Love 的 *A Social History of Swimming in England, 1800–1918: Splashing in the Serpentine*。這兩本書討論的面向都相當豐富，例如 Wiltse 考察市立游泳池在美國各城市發展所形成的休閒文化及與種族、性別、階級、健康等元素交織的演變，而 Love 則關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游泳歷史中的專業訓練、學校教育、救生會、青年運動、衛生保健、兩性互動等層面。² 此二書重點雖異，卻都不約而同描述了游泳在（美、英）該國的整體發展與不同時期的演變進程；兩位作者在其章節安排中，皆呈現出不同歷史階段重點有別的主題發展。《閒暇、身體與政治》一書則選擇聚焦於香港、廣州、上海與北戴河等地游泳活動的開展，較未著意勾勒游泳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整體樣貌，及其（是否有）階段性演變。若從此書可繼續推展的向度來看，則我們期望那是個超越沿岸、走向（或兼顧）內地，且考察階段性（包括不同政權在戰爭與承平時期是否影響）發展的游泳社會文化史研究。換言之，即擴展區域性與階段性，讓游泳在中國社會的多樣形態及其在不同時空因多種因素的交織展演樣貌，可以更清楚地被呈現。

² Jeff Wiltse, *Contested Waters: A Social History of Swimming Pools in America*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Christopher Love, *A Social History of Swimming in England, 1800–1918: Splashing in the Serpentine* (Abingdon,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08).

此書以香港為起點，讓讀者了解到游泳這種活動，以及西式的游泳文化在中國如何形成並發展為大眾休閒方式、體育競賽項目、摩登時尚重點、兩性社交空間、乃至當局規範要項。筆者好奇的則是，幾乎同時期也在西人的發現下逐漸被開發為海濱勝地的北戴河，又在揭開中國游泳文化的序幕中，扮演何種角色？換個角度問，香港與北戴河同樣受西方（也許異質的）因素驅動而讓游泳開展成閒暇活動，可謂共同身為中國游泳文化的起點，兩處的歷史是否（或難道沒）有任何關聯？作者在第一章與第五章分別討論香港與北戴河不同重點的游泳活動，讓一南一北同受西力影響而形成的中國游泳文化，似乎彼此獨立發展，互無關聯。且北戴河那章，作者的重點在論述西人與華人開發該處海浴空間彼此權力競逐的民族政治，以及該處從民國階段做為中上階層的閒暇空間，演變到中共建國後做為工人休養空間此一過程展現的階級政治。因此，讀者未能了解作為北戴河海域空間主要客源的北京或天津等鄰近城市，其游泳場、游泳教育、游泳比賽、或游泳閒暇文化的情形，也無法掌握這幾大城市呈現的北方中國游泳文化的發展。綜言之，本書雖饒有深度地討論香港和與北戴河各自在開展游泳活動與海浴空間過程展現的文化特色，卻未釐清看似雙頭並進（也許影響強度有別）的中國游泳史早期脈絡；游泳文化出現後的中國社會圖景，因此稍嫌片面而不夠清晰完整。

以上疑問，引發筆者回頭思索此書所呈現的近代中國游泳「文化」樣貌究竟為何。作者在〈緒論〉中，說明「在社會文化史的視角下，『游泳』不單是體育運動，也是『文化實踐』及『權力體現』」（頁18），但全書並未真正對游泳文化有所界定或概括綜述。作者確實討論了多元的游泳文化，包括個人/集體休閒的海浴文化，游泳穿著的時尚文化，競技性質的比賽文化，男女親近的社交文化，權威規範的黨政文化等各層面。略感可惜的是，這些不同層面的閒暇/競賽運動、身體實踐或權力競逐所展現的游泳文化，雖在書中不同篇章被交互呈現、且不乏精闢論點，惟缺乏對這些不同面向進行整合或勾勒出歷時性的游泳文化發展。此外，某些筆者同感好奇的問題，如中國何時在各大城市開始較廣泛興建游泳場？這些游泳場或海浴空間的興建，是否（及為何）有地域性、時間性或其他因素的差異？各處游泳場使用者的（階級、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身分，如何展現出該市或該地區的閒暇文化特色？游泳何時被教育部納為中國（中等或/與高級）學校教育的體育項目之一？香港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城市或學校，出於某些因素以訓練傑出泳將而聞名？這些訓練或發展，在多大程度上與國族富強精神有關，或者展現了其他時代、地區等特色？中國的游泳文化是否在沿海較盛行而內陸興趣缺缺？同樣有著名海浴場的青島，乃

至其他較無西力直接影響、而是受上海等大城的時尚閒暇風潮影響的城市游泳場，又是怎麼出現並形成某種（或許較具本地色彩的）游泳文化？中國富戶是否也有人效法歐美等國在自家後院蓋游泳池？（若有）此種家庭／個人化的發展，是否讓游泳文化產生質變？這些問題，仍有待日後學者進一步探索。

最後，是關於性別這一環。如作者所言：「男女是否應該被允許一同游泳，是游泳性別史的一項重要課題。」（頁109）此書的確處理了不少泳池內外衍生的性別議題，或游泳文化導致的社會性別焦慮。再一次，由於本書採取以不同城市為研究個案的章節安排，以致關於性別的討論，也程度不同地散見於幾章中。筆者覺得特別能呈顯游泳涉及的性別政治的「男女分／共泳」政策，則分別散諸廣州與上海的第二、三章中，沒能為讀者在這部分梳理出清楚脈絡或較完整的歷史演變。作者曾表示：「雖然上海華人社會的游泳風氣比廣州晚了數年才發展起來，而且上海一些游泳池在某些時段仍然採取男女分泳措施，但上海華人並不認同廣州政府〔於1934年〕在游泳場全面實施男女分泳的命令。」（頁115）然而，這種男女分泳或合泳政策的相異，不盡然與哪市游泳風氣先起有必然關係，反而可能與該市既有的兩性文化、社會風氣或政治考量較有關。由此書可知，男女共泳或分泳的主張者，並非依性別、華洋界線而區隔。每個城市也可能因各自市府或相關組織的人事、意識形態等因素，而曾提出不同立場。筆者私心希望此書能有專門篇章，綜合析論男女共泳或分泳的政策、輿論與實踐在各地的發展，以得更清楚闡明當性別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例如三十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的文化保守主義）下，仍可能因不同情境、人事或經驗而交織出各具獨特性的發展（例如當時只有某些、而非所有城市或地區實行男女分泳政策）。女人究竟是比較怕水（覺得需要靠男人協助或教導才能下水游泳，因此傾向男女合泳），還是比較怕男人（的干擾、眼光、乃至騷擾）？她們在游泳池內外，可能因地、隨時而發展哪些新的身分認同（女泳手、女教練、摩登女性……）、身體實踐、情感發展與抵拒對策？這些婦女與性別史課題，都可透過考察男女分／合泳在不同地區與階段發展，而被深化討論。

雖然作者自稱是早鴨子，但其研究功力之於《閒暇、身體與政治：近代中國游泳文化》，差可媲美楊秀瓊之於游泳。此書值得治近代中國史、跨國史、社會文化史、身體史與民眾生活史等各領域專家學生，以及對游泳、穿泳衣或觀泳賽有興趣的人一讀。一言以蔽之，這是本可向大家推薦的好書！

許慧琦